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侵略军兵分数路，向上海闸北悍然发动进攻，“一·二八事变”从此爆发。在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情况下，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等和上海广大民众奋起抵抗，奏响了全国抗战悲壮雄浑的前奏曲。轰轰烈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已成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反抗外来侵略的典范而载入史册。

一、蓄谋已久的侵略者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武装侵略，引起了我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也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哗然。日本为长期占领东北，企图制造伪政权“满洲国”，因此决定在上海制造事端，向国民政府施加种种压力，镇压我国人民的反日运动，转移国际视听，并进而扩大日本在上海的势力范围及排斥英美法列强在华的势力。

在此原则指导下，“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就开始在上海寻衅闹事，制造事端，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了。

1932年1月9日和21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了两条与日本有关的如实报导，因为此报在全国颇具影响，且持反日态度，故而日本侵略者趁机借题发挥。日本驻沪总领事、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多次亲自或派人去上海市府和报社进行所谓的“抗议”，他们嚣张地提出要进行“更正”、处罚负责者、保证今后各报不再有此种“不逊”行为和言论等，还发出所谓“最后警告”，如不一一照办，则将“用断然手段处置”。与此同时，日本海军舰只和陆战队大量增援上海，日军士兵不断在虹口地区实行武装巡逻，制造紧张气氛。海军陆战队第一外遣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还要挟公共租界工部局，说什么工部局如果不处置上海《民国日报》，那么海军陆战队将予以封闭。1月26日，迫于压力的工部局不顾报社的反对，决定“劝令”《民国日报》“自动”停刊。当天下午，工部局派出巡捕多名至报社，迫令报社员工悉数撤离，强行封闭报社门户。上海《民国日报》遂成为日军蓄意制造事端的第一个牺牲品。

与上述事件相比，“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则成为“一·二八”事件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三友实业社毛巾厂是上海的一家著名的民族工业企业，其产品因价廉物美而在竞争中压倒了日商同类产品，因此深为日商所嫉恨。“九·一八”事变后，该厂员工激于爱国热诚，不但在工厂附近积极宣传抗日，而且还组织了义勇军操练不断，这便又引起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的高度警惕。在此背景下，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辅助官、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操纵日本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选定了这一工厂为挑起新一轮事端的地点。

与此同时，上海滩上混迹着一伙日本日莲宗的佛教右翼派别，他们以专事暗杀活动的海军特务井上日台为领袖，组织恐怖组织“血盟团”。其弟子天崎启升等人受其委派，以“化缘”为名浪迹沪上图谋不轨。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认定这伙人有政治野心，颇可利用，于是决定利用这伙人去三友实业社毛巾厂寻衅肇事。另外又收买和雇佣了一批流氓打手，冒充毛巾厂工人，伺机混入人群中，貌似“反抗”地击毙肇事的天崎启升等人，以此制造流血

事件。

1932年1月18日下午，天崎启升等五人以举行“寒中修行”为幌子，在马玉山路（今双阳路）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门前敲鼓击钟，还向厂内投掷石块。其鬼鬼祟祟的行迹遂引起厂内义勇军注意，义勇军成员立即跟踪其后。天崎启升等人见工人们尾随而来，便向马玉山路租界方向逃窜，逃到赵家宅附近时，遭到工人的拦截盘查。此时，由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事先收买和雇佣的那批打手，化装成工人模样混入义勇军之中，对天崎启升等人用石块猛砸猛打。最后造成日僧一死二伤。打手们见日僧或死伤或逃逸，便一哄而散，将责任嫁祸于工厂工人身上。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日僧事件”。

这一事件完全是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的。正如战后田中隆吉的自供状所言，他知道三友实业社是“非常共产主义的、排日的，是排日的根据地”，于是就让他很“亲近的女子”川岛芳子，去“巧妙地利用这个公司的名义来杀死日莲宗的化缘和尚”。最后由于日僧一死二伤，于是他便认为“这时候的确可以搞出点名堂来”了，随后他命令刚来上海的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袭击三友实业社。因为田中隆吉深信，“这样一来，日华之间必然引起冲突”。

重藤千春果然“不负重望”，1月20日凌晨2时许，他带领日本浪人团体“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60余人，在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队员的掩护下，借着沉沉暮色偷袭三友实业社总厂。只见他们潜入厂房所在地，硫磺弹、浸油的纸团和手榴弹便飞入了厂房中，厂内顿时火光冲天，损失极为惨重。在放火焚厂之际，重藤千春及其同伙还打死前来弹压的工部局华捕1人，打伤2人。

真所谓“恶人先告状”，就在当天下午，上海日侨在日本军方的鼓动下举行千人大会，声称现在中国的抗日“暴行”已达极点，日本应立即派军“以期灭绝抗日运动”。会后，600余日侨手持棍棒举行游行示威，沿途高呼“杀尽中国人”，还用棍棒猛击中国商店的橱窗玻璃，撕毁抗日标语，强阻电车行驶，殴打值勤巡捕。一时间，上述地段鬼哭狼嚎一场混乱。

日本驻华使领机关秉承日本政府的旨意，同时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1月19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上海市府抗议日本和尚被杀，要求缉拿凶手。21日，他又向上海市府再度提出所谓的“抗议”，毫无根据地咬定杀死日僧的凶手是三友实业社工人，还进一步提出正式道歉等项要求。25日，接到日本外务省催急的日本驻沪总领事再度约见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指责中方“无诚意”，扬言日本政府已赋予驻沪总领事采取任何步骤之全权。

事实证明，“一·二八”事变决非几个日本特务分子所能制造出来的，它完全是日本军政当局既定的侵华政策的产物，所谓“日僧事件”、“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不过是日本侵略者用以发动蓄谋已久的战争的导火线而已。

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中国当局

“九·一八”事变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了对日“不抵抗”政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民众和一切爱国者的反对，也促使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时至“一·二八”事变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一度由主张对日强硬的孙科派执政，然而随着孙科政府的昙花一现，由蒋介石、汪精卫联合执政的国民政府提出并实行起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与“不抵抗”政策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却有若干局部的变化，其中妥协成了这一政策的基轴和灵魂。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蓄意挑起“一·二八”事变前后，南京国民政府便始终以这一政策作为指导方针。

正如上面所言，当日本侵略者在上海频频发难时，南京国民政府对此问题则持矛盾的态度。从一方面看，上海是全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且与首都南京毗邻，国民政府自然不会容忍日军的险恶企图。因此蒋介石曾指示上海市原任市长张群：“日本军队如果至华界挑衅，我军应预定一防御线，集中配备，俟其进攻，即行抵抗。”但在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又非常害怕这种抵抗会导致中日全面开战，从而破坏其“安内攘外”的基本国策。因此在“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的意图只是要日本的挑衅和进逼不超过一“最低限度”，即武力侵占上海进而威胁其在南京的统治，而在这前提下它力求妥协退让，尽量避免冲突。

1932年1月22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蒋介石汇报日人在沪暴乱情形，蒋介石发言坚持其“先安内，后攘外”的一贯主张。23日蒋介石、汪精卫还命令吴铁城“制止民众抗日”。为防止驻守上海一带的第十九路军对日开战，蒋介石还命令将第十九路军于五天之内调离上海，派宪兵第六团接防。其妥协退让的态度昭然若揭。

在上海，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向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限中方在28日下午6时以前作出圆满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当天下午，吴铁城会同军政部长何应钦、司法院代院长居正、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伦和张群共商对策，最后决定接受日方提出的全部要求，国民政府旋即批准吴铁城等人的上述决定。28日下午2时，市府秘书长俞鸿钧用正式公函送交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全部承诺日方于21日提出的四项要求。

同日，上海市府下令由公安局和社会局负责取缔各抗日团体，禁止民众抗日集会。他们先后查封了设于河南路桥天后宫的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设于各区的日货检查处，还要求上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同意停止抵制日货，去掉各团体名称上的“抗日”字样。

除此之外，国民政府深恐十九路军会对日军的进犯采取反击，他们对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进行了反复的“说服”。1月24日，国民党要员张静江约见蔡廷锴，要他体念中央意旨，将部队撤至南翔以西，避免与日军冲突。何应钦也专程来沪，劝蔡廷锴“忍辱负重”，撤军至南翔以西。25日晨，国民党中央委员顾孟余奉命来沪传达南京关于“保全上海经济中心，隐忍避免冲突之原则”。27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闸北的防务，预定29日早晨完成换防工作。

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认为既然已全部答应日方的要求，又撤换了有抵抗可能的部队，与日军的正面冲突因此就可避免。但侵略者的进攻计划早已确定，这些妥协退让之举非但不能避免战争的爆发，相反进一步助长了

侵略者的气焰。同时，十九路军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众日趋高涨的反日情绪激励下，最终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日救亡的大旗。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更是历史的必然。

三、“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震撼了具有光荣反帝传统的上海，上海人民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犹如一泻向东的浦江潮。这场以抗日救亡为主旋律的爱国运动最终为“一·二八”淞沪抗战奠定了强大的群众基础。

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同年12月间是上海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勃发时期，在此期间各界民众用各种方式声讨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抨击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组织抗日义勇军，抵制日货，真所谓波澜壮阔史无前例。当日本侵略者制造“上海《民国日报》事件”、“日僧事件”和“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后，上海民众更是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了自己的这种激愤之情。

在此期间，上海许多民众团体和行业团体纷纷发表通电、宣言、声明和谈话，强烈要求政府当局进行正当自卫，回击外敌的进攻。仅从1月21日到28日事变爆发这短短的一周时间中，上海市商会等团体发出了数十个通电和宣言，提出一系列的主张和要求，成为“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直接舆论准备。当1月28日上海市府屈辱地承认日本驻华总领事馆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后，上海市民联合会当天在新世界剧场召集全体大会，反对吴铁城封闭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呼吁全市各界立即成立救国义勇军，积极筹款备战，坚决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侵犯。有些抗日团体还立即举行了示威游行，要求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当局接受日方的无理要求。

与此同时，驻守上海和沪宁线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十九路军，正以高昂的爱国激情摩拳擦掌地准备和进犯者决一死战，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无疑对他们影响极大。

十九路军源于粤军第一师第四团，是孙中山为首的广州军政府辖下的一支拥护革命的军队，历来训练有素，作战勇敢。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这支部队虽然一度成为蒋介石的反动工具，但它毕竟接受过第一次大革命洗礼，特别是在江西“剿共”战争中得到的教训，受到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尤其不可低估。他们亲眼目睹工农红军的英勇善战，人民群众与红军的鱼水关系，同时又因非蒋介石嫡系部队而有他的难言苦衷。故而该军广大官兵，特别是一批颇具反帝爱国思想的军官强烈要求改弦更张，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是对十九路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该军广大中下级军官闻听日军占领沈阳，“无一不怒发冲冠，振臂扼腕”，他们向蒋光鼐、蔡廷锴建议，都认为“剿匪徒劳无功，应转向抗日，以尽军人天职，为国家民族争取生存及光荣”，“开赴东北抗日，收复失地”。他们全体官兵曾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总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早已深入十九路军官兵的人心。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宁粤和议为十九路军从江西“剿匪”前线调往沪宁一带提供了契机。从1931年2月起南京国民党蒋介石派与广东国民党胡汉民派公开对立，但时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双方不得不发出“共赴国难”的呼声，由于十九路军的政治领袖陈铭枢既与粤系关系深久，现又得蒋介石的信任，遂被蒋介石选为沟通宁粤双方的重要中介人物。而为了促进粤方代表前来上海参加议和，并以示笼络收买，蒋介石便决定调有着陈铭枢背景的十九路军进驻沪宁一带，作为粤方代表的安全保障。1931年9月30

日，国民政府任命陈铭枢为京沪卫戍总司令官（1932年1月6日由蒋光鼐继任）。11月20日十九路军抵达上海，蒋光鼐任总指挥，军长蔡廷锴，原十九路军参谋长戴戟出任淞沪警备司令。

此时的上海滩，早已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大火炉，十九路军置身于此，其抗日热诚便更上了一层楼。据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回忆，他有一次在上海某家旅馆逗留，侍者曾责问他道：“你们为什么不去和日本人打仗？”翁照垣羞愧交加，无言以对。其他十九路军军官也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以致后来不敢穿军装出门。十九路军士兵们外出购物，也常遭上海市民的冷落。这种难堪的处境更增强了官兵们的抗日要求。1931年12月，刚刚抵达上海接防的蔡廷锴便开始在军中组织志愿军，准备以西南国民义勇军的名义开赴东北参加抗战。这可作为明证。

1932年1月中旬以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上海挑起了一次又一次蓄意已久的事端，十九路军领导人便开始了军事部署。蔡廷锴听取下属军官汇报敌情后，曾拍案而起：“日本人欺侮我国太甚，只要蔡廷锴在上海，绝不令日人踏进我寸土！”1月15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从其所得情报中判断，日军进犯已不可避免，于是立即就抵抗和作战问题进行了密商。他们一致认为，如果日军发动进攻，我军应进行抵抗。“我东北军过去的抵抗，已铸成今日的大错，纵成敌人的骄横，启发国际的蔑视，中国军人的价值已毫无存留的余地，现在岂容再误！”这就是他们的心声。其次，他们还一致决定在该军的原来淞沪前线防地进行抵抗，并就具体要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以示抗日的决心。当得到陈铭枢和孙科主持的国民政府复电同意备战计划后，十九路军立即进行了作战准备工作。

“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后，十九路军进一步加紧了各项战备。1月19日，蒋光鼐在龙华上海警备司令部召集的会议上作出了有关战备的6项决定。21日蔡廷锴拜访陈铭枢，当面请示当日军侵犯我时我军应采取如何方针，陈铭枢明确答复道：“当然不客气，武力抵抗！”23日蒋光鼐和蔡廷锴、戴戟召集该军驻沪部队营级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作出死守上海的决定。“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会议还强调十九路军在物质装备不如日军的情况下，应学习江西红军“避重就轻”的战术。全体与会人员都表示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根据会议决定，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于23日下午7时向全军发布关于淞沪抗战的第一道密令：“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全力扑灭之。”命令下达后，十九路军官兵无不情绪激昂，准备随时与日军一决雌雄。同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书，严正宣告：“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我不自救，谁能救我”，“冲锋吧！让我们来高呼：杀！杀！杀！”这充分体现了十九路军领导人抗日御侮坚定立场。

1月24日，蔡廷锴等要员抵达苏州，召集该军驻苏州的将领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了十九路军抗战的决心，并传达说明了23日发布的第一道密令。与会将领们得知后，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从而使十九路军真正做到了上下一致浑成一体的态势。

龙华会议和苏州会议之后，十九路军各部进入了紧张的战备状态，有了比较充分的战役战术准备，至1月25日全体大体上按照23日的密令布置完毕。

28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还发表了《告淞沪民众书》，表示十九路军“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的决心，并进而提出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为日后军民联袂抵抗外敌入侵提出了最初的设想。

然而正当十九路军加紧备战之际，蒋介石、汪精卫和何应钦等却一再电令十九路军领导人不得与日军发生冲突，正如上面曾已叙述过的，他们不仅亲自出马“劝说”，还动员社会各种势力的“头面人物”出面“动员”。直到1月27日何应钦正式下令由宪兵第六团接替十九路军在上海闸北的防务。蔡廷锴在极不愿意的情况下勉强表示服从军令，准备移交防务，但他仍命令在宪兵第六团未接防前，十九路军仍坚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刻。如日军胆敢进犯，我军为自卫计，应立即予以迎头痛击。

蓄谋已久的侵略者决不会因为对手的妥协退让而满足的。不出十九路军的预料，24小时后，战争终于降临在上海这一中国最繁华的城市的头上。它是那么的无法避免，而对早已枕戈待旦的上海军民而言，有这一保家卫国雪洗前耻的机会，又是那么的无上荣光和幸福！

四、“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

1932年1月28日，应该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一天，因为在那一天，中国军民终于奋起反抗日本侵略者了！

28日下午2时，上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出面全部答应日方的无理要求，日方表面上也“表示满意”。到了下午4时，迫于日方压力的工部局下令在上海租界实施戒严，这一措施为日本侵略军发动进攻提供了方便，却为中国军民进行抵抗的准备设置了障碍。

晚上8时半，日方眼看上海市府“圆满答复”而无可借口，于是派人提出挑战性的“声明”，要求中国军队撤出闸北。但这一“声明”直至第一声枪响起的5分钟前才以信函形式分别送交上海市长和市公安局局长。日方之险恶用心，由此可管窥蠡测了。

到下午，十九路军预知日军进犯意图，已在各扼要路口布置防御工事，双方对峙之态势已到了剑拔弩张的时刻！时至晚上，前来接防的宪兵第六团到达真如，为了防止日军乘机进攻，蒋光鼐和蔡廷锴决定第二天早晨换防。

当晚11时，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接到戴戟电话，说据报日军有占据闸北之企图，将于晚上进攻我军。11时20分，其下属的第6团团团长张君嵩报告说，各营官兵已各就各位，并报告说日军已在北四川路天通庵车站一带集合。翁照垣当即告诉张君嵩：“好好准备，杀敌机会快来了！”

11时10分，日本陆战队一小队数十人，由便衣日探带领，由四川北路的陆战队司令部所在地进占中国军队防地天通庵车站。当时车站人员均已撤走，我方在最前线警戒的只有6名警察，他们挡不住敌军的进犯而退却。市公安局警察第二中队闻讯赶来，也只有60多人，无法阻止敌人的进攻。日军占领天通庵车站后，即以此为据点发动进攻。

11时30分，正当第6团进入阵地后不久，在寂静而又紧张的气氛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极清亮的步枪声，接着便是密如连珠的机关枪声，这是日军首先从天通庵车站向淞沪路沿线中国守军发出的第一枪！

此时，翁照垣旅指挥部的电话中传来了张君嵩团长急促而又略带激动的声音：“日军已开始向我们进攻了！他们由虬江路、广东路、宝山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处，用铁甲车掩护，向我们这边冲过来！……”

“打吧！不许退走，守住原有阵线……”这是翁照垣旅长的命令。

伟大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揭开了战幕！

五、初战告捷的闸北保卫战

闸北是上海市区华界的一个重要地区，它与公共租界北部的虹口地区相毗邻，上海陆上交通枢纽的铁路上海总站的北站也坐落在此。另外，这里还是上海民族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也是华界市民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同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就设在靠近闸北天通庵车站的四川北路底。因此，日本侵略者为了扩张其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更竭力企图将其触角地域从虹口伸展到这块人杰地灵的区域，进占闸北自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第一个战略目标。

“一·二八”当晚开战时，虽然十九路军已有所准备，但在此地敌军的兵力为我军的3倍，武器装备更是远远优于我军。就在这种优劣悬殊的情形下，从1月28日晚11时30分到29日早晨6时前，我军先后击退日军向闸北发起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充分表现出我十九路军官兵英勇善战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杀哟！杀哟！……”当十九路军官兵第一次看到日本侵略军时，一个个眼睛都红了。只见一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了出去，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巨响和团团烟尘飞腾入空中，随后机枪一阵扫射……惊慌失措的敌军顿时死伤一片，阵地前尸骸枕藉，活着的只剩下抱头鼠窜的份了。第一次与日军正面交锋给十九路军官兵的初步印象是：“我们的士兵不可思议的勇敢，而敌人却出乎意料的懦弱！”上等兵伍培、伍全兄弟二人，在闸北宝山路奋不顾身地和敌人肉搏。他们左冲右突，见一个刺一个，刺毙约十几个敌兵后，终于殉国牺牲了，而围攻他俩的敌人是他俩的10倍！敌人的第一次进攻就这样被击退了。

29日凌晨1时半左右，日军增援部队赶到，又发动了第二次进攻。我十九路军官兵面对强敌，仍然一步不退，用手榴弹和他们对掷，用刺刀和他们相搏。不时会传来一声轰响，敌我双方士兵便都碎身于手榴弹的爆炸之下。青云路和横浜路两处路口筑防御工事为敌装甲车冲毁，士兵死伤甚多，战况非常危急。此时此刻，只见我军官兵迅速登上两旁的横浜路医院大楼和光明玻璃厂楼房，居高临下据险抗击，在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袭击下，敌军抛下了100多具尸体狼狈退却。我军恢复阵地后立即重筑防御工事，依险据守。敌人的第二次进攻又被击退了。

29日凌晨4时40分左右，日军发动了第三次进攻。这次进犯较前二次更为激烈，他们先是出动飞机数架猛烈轰炸我军阵地和民房，随后以铁甲车为掩护发动地面攻势。虬江路、宝山路一带战况最为激烈，由于战火弥漫无法施救，一时烈火冲天浓烟笼罩。当大火延烧至我军阵地时，火热灼伤了士兵们的肌肤，他们就用湿毛巾蒙面而坚守阵地。接着我军向日军发动进攻，冲过淞沪铁路以东地段，进入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广东街内和四川北路附近，并将靶子路（今武进路）一带敌军加以完全肃清。敌军后退至四川北路，向日本小学方向败逃。敌人的第三次进攻又以失败告终了。

在这一夜的闸北保卫战中，我军官兵斗志高昂，前仆后继，其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不可胜数。所谓“匹夫不可夺志”、“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的民族精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用翁照垣旅长的话来讲，官兵们临阵的勇敢，“是他们自己所没有预想到的。”而日军叫嚣的4小时之内可完全占领上海的迷梦也永远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六、“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

随着“一·二八”淞沪抗战一声枪响，全市人民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援抗战的热潮，这给了十九路军官兵以极大的鼓舞。

就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便通过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的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坚持抵抗。与此同时，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的指示精神，积极和勇敢地领导上海各界救亡团体进行了广泛的抗日反帝斗争。蒋光鼐、蔡廷锴和戴戟日后曾经追忆道：“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展开了对十九路军的热烈支前工作。他们策动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等。有的在前线配合作战，有的担任后方勤务的任务，对作战、供应各方面，起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在这一群众性抗日救亡热潮中，一批著名的爱国人士和各界领袖人物也起了积极的作用。1月30日上午，宋庆龄和何香凝顶风冒雪赴真如十九路军指挥部慰问英勇的抗日将士们。她们与蔡廷锴亲切交谈，表示热烈支持对日抗战。她们赞扬十九路军违命抗战，认为这样才能洗刷“九·一八”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奇耻大辱。宋庆龄还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英勇作战的官兵们发表演说：“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2月12日，宋庆龄又冒着猛烈的炮火和炸弹的危险，到一五六旅前方慰问官兵。翁照垣旅长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九时许，总理夫人一行亲来前线慰劳我军将士。她们在土屋里落座时，敌机即在上空飞行。我奉陪她们巡视一周，到11时许方离去。当她们走过田野时，敌机一再飞过头顶，并放枪。”宋庆龄还在前沿指挥所接受战地记者的采访，她高度赞扬了十九路军英勇抗战的伟大意义，盛意赞扬了翁照垣旅长。翁照垣旅长代表全旅官兵十分激动地表示：“以卫土为责之将士，决不使敌人稍肆横暴，使敌人决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与此同时，宋庆龄和何香凝等还发动带领妇女界、医药卫生界、文化界等各界人士开展了支持前线和救护济难的活动。

上海进步爱国文化界也奋起声援淞沪抗战。2月3日，鲁迅、茅盾等43位文化界著名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声援十九路军抗战。2月7日，巴金、丁玲等129位爱国人士签名发表了《中国著作家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同时，陈望道等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成立了“著作者抗日会”，联合和团结了全上海赞同抗日救国的大批作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家和新闻工作者，实际上成为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的抗日联盟组织。

上海工商界也热烈地参加到抗日救亡的热潮中来了。以上海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的上海抗日救国会以积极的姿态参加抗日救亡斗争，尤其是在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月29日6时上海市商会为抗议日军侵略上海，表示与敌不共戴天的决心，发出了紧急通告，命令全市商店“一律罢市御侮”。1月31日，《申报》总经理史量才、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和工商界领袖虞洽卿等32人发起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旨在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史量才在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词：“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

国奴，死不作亡国鬼。现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持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史量才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赞同。不久，2月18日，上海地方维持会与上海市总工会等81个民众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各团体抗日救国联合会”，这一组织的成立，标志着上海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得更广泛了。

淞沪抗战的消息一经传开，全国各地便掀起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抗日救亡高潮。南京、北平等城市纷纷集会通电，声援十九路军，他们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何如迎头痛击。”各地许多学生、工人、职员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奔赴上海，直接参加战地工作。各地民众还踊跃捐募金钱、物品、药物和军用工具，其数量之大，种类之多和参加捐募的各阶层人士之广泛，都是史无前例的。总之，“一·二八”事变的爆发将抗日救亡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七、“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参加淞沪战斗才好”

十九路军奋起抗战的消息震动了神州大地，也震动了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上层军政要员中主张抗日的也纷纷起来要求一致对外抗日。

1月29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孙科等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政府此时，当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报国家，以谢民众。”31日，孙科等19人又致电何应钦，抨击蒋介石政府对淞沪抗战不加援助。2月14日，国民党内粤派领袖胡汉民在香港发表谈话，指出在日军未退出上海之前，政府无交涉可言，他还致电十九路军表示敬意。1月31日，唐绍仪等26位国民党要员也致电十九路军将士表示敬慰之意，另寄40万元汇款以示支持。

在全国朝野一片主张抗战的呼声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对日本进攻上海的行动也深感忧虑。蒋介石在1月29日的日记中深为震惊地写道：“闻昨日对上海日领要求，我方已予承认，彼亦满足，且表示傍晚撤军，何乃至午夜又冲突也，……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

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国民政府终于转到了在上海实行抵抗的立场上来了。1月29日，蒋介石确立了“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积极抵抗”作为淞沪战争的指导方针，同时他还制订了应付淞沪战争的《京沪防卫与军政部署》，从军事上作出了进行抵抗的初步计划。

就在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以示政府长期抗战的决心，另外组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主持工作。会后蒋介石发出《告全国将士电》，这一声明虽然含有不少属于表面价值的成分，但显然同“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的态度有所不同，或多或少地表示了他决心抵抗的态度。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具有鲜明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作出有限度的局部抵抗，另一方面又竭力避免战争的扩大，试图通过积极的交涉活动，尽量争取到一个较为有利的条件以实现妥协停战。

而在国民党军队中，要求抗日的呼声也正一浪高似一浪。从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到2月20日前后，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将领公开发表通电，一方面对十九路军的抗战表示声援，另一方面则要求开赴前线直接参战。这些抗战呼声不但来自国民党军队中的地方部队和桂系、粤系、湘系等部队，而且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江西“剿匪”前线的部队也发出了要求开赴抗日前线的呼吁。

就在蒋介石黄埔系嫡系部队中，抗日潮流也在兴起。陆军第八十七、八十八师系中央军的精锐之师，可谓蒋介石的“御林军”。当淞沪抗战爆发后，两师官兵群情激奋，对十九路军的英勇抵抗深表同情，他们一致要求立即开赴上海参战。1月30日下午，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宋希濂前往南京军政部面见何应钦，代表全旅陈述请求开往上海参战的强烈愿望，但遭到了何应钦的拒绝。当天晚上，宋希濂又率全旅营级以上军官30余人向何应钦再度提出抗日的要求，直到深夜1时多方返回营地。2月1日，驻守杭州的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致电蒋介石，要求带领全师开赴上海参战。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为黄埔系的重要将领，他对国民政府按兵不援十九路军的做法极为不满。2月初他在浦口与蒋介石见面时，当面向蒋介石提出：“我们中央的部队必须

参加淞沪战斗才好，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我愿意去。”迫于国内外的形势，蒋介石最终于2月14日颁布命令，将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及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隶属十九路军总指挥部直接赴上海参战，它成为国民政府支持淞沪抗战的最重大举措。

八、击退日军第一次总攻

正当国内外抗日高潮风起云涌之时，淞沪抗战战场上的形势也变幻多端。日军在1月28日深夜发动全面进攻后，在闸北保卫战和相继爆发的北火车站保卫战中并没有得手，就是在1月29日和31日先后两次由英美居间调停的暂时停火期间发动的小规模进攻也损失惨重。2月2日起，日军第一次向淞沪增兵，2月4日开始了第一次总攻。这次总攻分别是在吴淞和闸北两地展开的。

吴淞要塞位于长江与黄浦江的汇合处，呈一三面环水的突出部，要塞炮台就设在这个突出部上。日军增援部队要在上海北面的长江沿岸登陆或进入黄浦江再行上陆，都必须通过这里才能实现。于是吴淞要塞便成为日军进攻的战略要地。

2月3日日军曾对吴淞要塞发起过一次未遂进攻，4日11时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便又开始了。黄浦江上驶来的13艘军舰和24架飞临上空的飞机进行了轮番轰炸，我驻军以迫击炮、机关枪相迎，一时间炮声隆隆不绝，江中的波浪水花四起，地上的烟尘泥灰纷飞。炮台守备营官兵伤亡惨重，无法在炮台继续支持下去而溃散了。面对日军企图乘机登陆占领炮台阵地，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下令死守，竭力制止敌军的登陆。战至下午5时，敌军终于放弃了登陆企图。随后在5日的日军轰炸后，日本海军的兵舰始终只能在长江和黄浦江上巡弋而最终难圆其登陆的美梦。

在闸北方面，2月4日上午7时许日军向我军阵地发起总攻，只见宝山路、天通庵路一带火光冲天，工事及房屋连连被毁。我军奋勇还击，双方血肉相搏，死伤甚大，尤其天通庵路一带我军的守兵大部牺牲，阵地一度被敌攻占，但不久又为我军恢复。2月5日凌晨敌军又继续发动攻势，其势头较昨日更为猛烈，但时至下午各路进攻均为我军所击退。对这天的惨败，公然为日军侵略行径张目的日文报纸《每日新闻》也不得不发出阵阵哀叹：“5日晨我军（指日军，下同）决行总攻击以来，为空前未有之大激战，敌军（指中国军队，下同）死力反抗，我军虽猛烈发炮，然彼竟东冲西扑，致我军不易进展。未几敌军以迫击炮袭击我军，致我军惨遭未曾有之惨败。”

2月6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继盐泽辛一为淞沪战场最高指挥官，这显示出日军的第一次总攻以失败告终了。

九、中国空军也参战了

在淞沪抗战开始之初，日军便始终掌握着制海权和制空权，这对我军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由于我空军力量过小，南京军政部起初并不打算动员空军参战，但因十九路军催促甚紧，最终决定调动空军参战。

2月5日空军将领黄秉衡等11人通电全国，表示抗日御侮、血战到底的决心。2月5日、22日、26日中国空军直接与日军进行了空战，从此开启了中国空军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先河。

2月5日之空战系攻击战。当时中午日军4架飞机袭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的真如，我军4架战机旋升空近敌，日机“凤翔”号被击中弹1发。我空军第六队副队长黄毓全不幸阵亡，成为中国空军在淞沪抗战中作战阵亡的第一人。

2月22日之空战系遭遇战。那天我军战机由南京出发飞往杭州，美籍飞行员萧特（Robert Short）驾机同时飞出，当时他驾驶的“波音”单座战机全无通讯及导航设备，与其他飞机失去了联系。下午4时20分当萧特飞抵苏州上空时，与轰炸苏州的6架敌机发生遭遇战。面对强敌萧特毫无畏惧，与优势敌人展开激烈空战，日军一机长中弹当场死去，另一机枪手中弹受伤，日机1架被击落。最后萧特的飞机不幸被1架日机击中，飞机坠毁于苏州附近，萧特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上海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征得他母亲的同意后，将他安葬在上海虹桥公墓，并举行了隆重的安葬仪式。

2月26日之空战系防卫战。上午7时许，15架日机飞抵杭州笕桥机场，我军虽是仓促应战，但石邦藩、赵普明等驾驶员奋勇迎战。在这场以寡敌众的空战中，两架日机被我机击中水箱而被逼迫降，并使日军歼灭我空军主力的阴谋未能得逞。

中国空军参加淞沪抗战虽然战果不大，而且受到了相当大的损失，但对于推动和激励抗日御侮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空军官兵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尤其令人感佩之至，而美国飞行员萧特也是虽死犹荣，重于泰山。

十、庙行大捷

日军对淞沪的攻势并没有因为第一次总攻的失败而结束，相反，当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接替盐泽辛一为淞沪战争最高指挥官后，日军变本加厉地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

野村吉三郎2月7日、8日正面进攻吴淞失败后，13日改为从蕴藻浜南岸进行偷渡，进占曹家桥一带向我军右翼迂回进攻，但亦以失败告终。此时日军利用英美等国调停企图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上海，同时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准备发起第二次总攻。

日军此次的进攻计划是实行“中间突破”，即从闸北到吴淞进行全线攻击，以牵制中国军队的兵力，其主力则集中指向江湾、庙行，妄图首先占领这两个战略要点，切断第十九路军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军之间的联系，随后再各个击破。2月20日早晨7时，日军悍然发起了第二次总攻。面对日军此次总攻，早有预料的我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首次并肩作战，共同抗敌，进行了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中国军队在闸北、江湾、庙行、蕴藻浜、吴淞、浏河等战线进行了全线抗击，其中以庙行之战最为著名。

21日晚8时30分，日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下达了次日重点进攻庙行地区的进攻命令。而我军在庙行一带前线的第八十八师约有3团的兵力，张治中和俞济时分别在军部和师部亲自指挥庙行之战。

22日凌晨1时起，敌第九师团主力约2万人乘着黑夜向我军阵地发起猛攻，来势极为凶猛。我军奋勇抗击，步枪、手榴弹、机关枪互相轰击投掷，战场上杀声交织，血肉横飞。至5时左右，竹园墩、庙行一带阵地遭敌军火炮射击已不下三四千发，所有阵地多被摧毁。敌军乘大雾弥漫的拂晓之际，以纵深重叠配备，向我军阵地节节进逼，战斗愈加猛烈。我军殊死抗击，敌军反复冲锋，双方展开拉锯战。天亮之后，敌军飞机、大炮轰击越发猛烈，我军伤亡惨重，麦家宅阵线被敌军突破。至此庙行前线战况十分危险。

第五军和第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接获庙行前线战况后，当即采取紧急措施。张治中军长亲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赴八十八师指挥部策应，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由火烧场向庙行镇增援，二六一旅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击敌军之侧背，俞济时师长则率部对敌军突入区施行反攻。十九路军总指挥部也于当天上午9时部署了从江湾至蕴藻浜及正面三方同时出击的作战计划。

俞济时师长亲自率队进入前线督战后，师部所有的预备队和工兵营等悉数投入了战斗，阻敌于严家桥等一线，与麦家宅方面攻来之敌军形成相持局面。血战至当天中午，敌军兵力用完，已无法扩大战果，而我军因增援部队已到，士气渐稳，阵线复趋稳定。同时，蔡廷锴军长下令六十一师2个团从侧部予以进攻，我军士气益盛。午后12时30分，敌军因庙行之南无力再发起攻势，遂在庙行镇至周巷一线增兵千余人，配合以飞机大炮的猛轰，几近孤注一掷地企图突破该线，从而包围庙行夺取之。

22日下午，庙行激烈的形势迅速向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八十八师、八十七师和六十一师3支劲旅不断向敌军进逼，逐步形成三面包围进犯庙行来敌的战局，迫使敌军开始步步败退。八十七师二五九旅的先头部队已开始从侧背向敌军发起进攻，并逐渐向南挺进包抄。同时，守卫庙行的部队从正面向蔡家宅方向的敌军进行了猛烈的反攻，敌军被迫节节后退。下午

5 时左右，六十一师增援部队加入了正面反攻敌军的行列之中，攻势自然更猛了。然而庙行正面的敌军虽遭我军三面夹攻，却依旧作困兽斗，拼命抵抗不止。

战至傍晚时分，敌军飞机停止活动，我军没有了来自空中的威胁，遂乘机发动猛攻，敌军最终无力抵抗而败退。晚上 7 时起，败退的敌军在赵家宅附近纵火焚烧；八十七师同时将北沈宅的敌军击退，9 时起完成从左路包抄庙行之敌。11 时起，六十一师占领孟家宅，将右翼之敌包围于金穆宅。到午夜 12 时，突入庙行阵地的敌军大部被击退，我军大部阵地失而复得。剩下麦家宅之敌被包围后仍作垂死挣扎，最后为八十七师彻底歼灭。当夜，二六一旅在已占领的防线上构筑工事，彻夜警戒。此时敌军已山穷水尽，一时再也无力发动进攻了。

庙行一役，惊天动地。庙行、江湾之间，敌军尸体堆积如山，计有三四千具之多。中国军队以伤亡 3000 余人的代价，夺取了粉碎日军“中间突破”作战计划的重大胜利。张治中在其回忆录中追忆道：“这一天的庙行战斗的激烈，为开战以来所未有，中外报纸，一致认为沪战中我军战绩的最高峰。”蒋介石在给张治中、俞济时的电报中也给予了庙行之战以高度的评价：“自经二十二日庙行镇一役，我国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英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正因为如此，庙行大捷便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占有了特别重要的地位而享誉中外。

十一、日军浏河登陆的前前后后

庙行大捷虽然打破了日军“中间突破”的计划，但并未能改变敌军进攻、我军防御的总体态势。淞沪战局在这之后便开始面临转折关头的到来。

就日军而言，敌军所占优势是有限的，它很难实现全面突破我军防线、一举击败中国军队的目的。然而就我军来看，兵员和弹药消耗极大，战斗力明显下降，急需新增援部队的到来。但是自1月28日开战以来，除第五军于2月中旬抵达前线外，直到2月底无一兵一卒增援淞沪战场，而日本政府却在2月20日决定第三次增兵上海。

就在此时，一向以“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为淞沪战争指导原则的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与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分歧和争论，也就更为尖锐和激烈了。庙行大捷后，他们的争论焦点在于：是继续坚持原有阵地进行抵抗，直至击败日军的进攻夺取战争的胜利，还是自动后撤到第二道防线，乘机谋和以妥协结束这场战争。这两种主张具体反映在是迅速增援前线部队，还是迟迟不发援兵，反而要求前线部队后撤。经过彼此双方反复磋商讨论，2月27日十九路军总部在援军无望，南京国民政府又命令撤守的情况下，蒋光鼐向第五军和十九路军发出违心的撤守二线的命令。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却正在积极策划再度增兵上海。2月25日正午，陆军大将白川义则就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除已在上海参战的部队外，增派2个师团开赴上海。29日上午10时，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发布了在上海西北约50公里的长江南岸太仓县浏河镇附近登陆的作战计划，淞沪抗战于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浏河镇附近的七丫口一带长江河滩平坦开阔，便于登陆部队上陆展开。从这里登陆可从左侧面对中国守军构成迂回、包抄之势，而且此地和昆山较近，如昆山失守则沪宁线交通即遭切断，上海守军的后方联系便会中断，后果不堪设想。日本侵略军正是出于上述战略考虑，便将浏河登陆作为首选的新一轮进攻目标。3月1日5时半左右，隐蔽航行的日军已开始接近岸边，至6时已占领了一段堤岸。

反观我方在此地段的守军，力量颇为薄弱，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只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的一个营和少数义勇军部队。这并不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领导人的失误所致，而完全是兵力不敷后援不继的缘故。当敌军在七丫口登陆时，我军在此处仅1连的警戒部队虽拼死相抗伤亡殆尽，却完全无力抵抗住敌军的进攻。至11时，日军第十一师团已登陆完毕。

上午10时，当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得到报告后，旋即发布命令，决定乘登陆之敌立足未稳之前将它赶回长江中。第五军第二六一旅五二一团第一营迅速开往浏河的屏障茜泾营，展开了浏河保卫战。第一营虽然陷于三面被围的危险状态中，死伤累累，但全营官兵仍奋不顾身，勇敢地屡屡发起冲击。战至傍晚6时，敌军占领茜泾营。

浏河保卫战虽然最后以我军放弃浏河而告终，但八十七师等部队的英勇战斗却在“一·二八”浏沪抗战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正如张治中日后的评价：“我军仅以一营之众，在茜泾营抗敌数倍之师，自晨以至深夜，使敌人不能有尺寸的进展，而我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卒使敌密集茜泾营寨内，虽以一师团之众，仍不得犯我浏河。”此评价可谓一语中的，是对守军部队

的最高赞誉了！

十二、“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1932年3月1日是淞沪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一天，由于日军第十一师团浏河登陆得手，使敌军在中国军队战线的左侧背实行战略展开，他们与正面的敌军相呼应，构成了对中国军队的包围态势。另一方面，日军第九师团这天的全线进攻也突破了我国军队的数处重要阵线。虽然我军拼死反击，阵地失而复得，但已无力巩固，更无力发起反攻了。

鉴于这种危急形势而后援无望，十九路军总部遂于3月1日晚决定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西撤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一线。由于我军后撤是一个主动的战略行动，组织得相当周密，撤退行动很有秩序，因此部队损失很小。而敌军均未察觉我军全线后撤的任何征兆，当我军离开阵地后，敌军第九师团第一线的部队，见前面我军阵地久无枪声，这才开始有所怀疑，旋即派出部队进行搜索，最终才弄清我军早已撤离了战场。至3月2日晚，十九路军、第五军和其他各部都已安然撤退完毕。中国军队以青阳港一带为主阵地，安亭、太仓之线为前进阵地，他们扼要防守以防日军的追击。

当我军在3月2日均已转换阵地时，守卫吴淞要塞区的十九路军翁照垣旅主力仍坚守不退。他们决心实践与炮台共存亡的誓言，愿将自己最后一滴鲜血洒在吴淞阵地上。2日下午，当敌军千余人在纪家桥附近偷袭，图谋抄袭吴淞时，当即遭到我军的痛击。当天上海和民众团体派出代表去吴淞，会见翁照垣旅长，要求他们率部转移后方。因为如果他们孤军坚守阵地，众寡悬殊，弹药接济便会断绝，不如及时转移阵地，保留主力部队以利再战。经过代表们的再三说服，翁照垣旅长同意转移。3月3日上午，该旅主力向月浦、浏河转移，同时以一部兵力继续抗击。他们派出数百人埋伏于同济大学东面，日军不知虚实，前进中突遭我伏兵袭击，大败而去。待我军退尽，日军方得以进占吴淞炮台。用翁照垣旅长的话来形容此时此刻的心情就是：“这时我将士心情之痛楚是不问可知的。”

当我军后撤到新防线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于3月2日向全国发出《退守待援通电》，宣布“于三月一日夜，将全军撤退到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3月3日，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暨全体将领又发出《泣告国人通电》，历陈一个多月来淞沪抗战的经过和此次后撤的原因，恳请全国朝野同胞为捍卫民族生存和国家主权奋起抗争，夺取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

在西撤过程中，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对追击的敌军进行了坚决的阻击，遂使敌军歼灭我军主力的阴谋不能得逞。日军不得不承认：“终于未能俘获（中国军队），达不到全歼之目的。”而我军各部队转移到指定地点后，为增强防线作持久抗战准备，许多部队构筑了第一、第二、第三的三线阵地。这些部队虽经数十天血战损伤甚大，但士气依旧高涨，抗战激情有增无减。由此，中国军队终于构起了坚固的第二道防线。

十三、“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们

日本侵略者发动的“一·二八”淞沪战争，给上海人民带来了生命、财产、经济、文化上空前的灾难，说来真令人发指。

在“一·二八”战争中，上海市区被日军蹂躏面积达 494.78 平方里，直接受害居民达 108816 户、814084 人，占全市华界人口总数的 45%，其中死亡 6080 人，受伤 2000 人，失踪 10400 人。惨无人道的日军对战区内的非战防御建筑物、居民住房和学校文化机构狂轰滥炸，使闸北、江湾、吴淞等战区遭尽灾难。据当时战地记者报道，闸北、江湾、庙行一带的惨相简直不堪入目。

闸北宝山路一带原为我华界的繁华地区，经 32 天炮火的轰炸，“由宝山路而至永兴路，几如身涉乱砾丛中，极目四望，但见一片残垣断壁，周围数里，一月前鳞次栉比之市局，至今已无一完整之屋宇矣。”再看江湾镇一带，“江湾镇已成一片焦土，瓦砾成堆，尸横遍野，掩埋乏人”。而庙行周围“战壕与河间及竹园坟山边，尸横遍地，一望无际，尸体类皆断手折足或残缺不全，有受弹伤，有身火焚身死，尸体间有被野犬咬食，只剩躯壳。”

残暴的日军对战区非参战居民更是滥捕、滥杀、奸淫、抢掠无恶不作。一位名叫蒋俊廉的记者 2 月 3 日上午在外滩附近被日军便衣队诬指为军事密探，旋加以逮捕，当晚 7 时许他被解送黄浦码头关入铁炮船上。据蒋俊廉回忆，“斯时偷观被难同胞，已有百数十人，双手反缚，蜷伏舱中，均血染全身，奄奄欲毙，臭气四溢，令人欲呕。船上派有武装陆战队 4 名，日夜看守，严密监视，并向同胞任意凶殴，刺刀、铁棍双管齐下。到四日，被日兵押上码头斩决或枪毙者约四五十人。六日下午，又将此中 20 人，捉去惨杀。”而在战争期间被惨害的中国老百姓又何止上述一例！

日军对战区中的中国妇女的蹂躏更是惨不忍睹，在此仅举一例。据虹口沈家湾幸免于难的居民回忆，他们的一位邻居因身怀六甲行动不便，无法外出逃难，于是“被日军所见，闯入其室，大肆强暴，妇哀免不得，竟致堕胎而死。”

在这场战争中，上海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战后上海经济几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据统计，全市财产受到的直接间接损失达 7.88 亿元，敌占区内工厂损失过半，上海市府 2 月份财政收入因战争减少 42%，全市工人因战争而失业者达 80%，仅棉纱厂失业工人就有 25 万人。民族工商业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上海橡胶行业 5 家厂被日军炸毁，9 家厂因受战争爆发的影响而不得不倒闭。到 1933 年，战前 48 家橡胶厂除个别厂家外，其余的不是倒闭便是濒于破产。更由于战争的影响，市场萧条，市民购买力日益下降，各业商店生意清淡，营业额下降。这又导致了百货行业商店的相继倒闭，而这股倒闭之狂风一直蔓延到 1935 年底。直到 1936 年，上海的民族工商业才开始有所转机。

上海文化教育事业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摧残更是难以用金钱来计算。据上海市教育局战后的统计表明，这次战争中受灾的学校总数达 238 家，财产损失达 1000 多万元，受灾学校失学总数近 4 万人，受灾学校失业的教职员总数为 3000 余人。其中高等院校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且不说校舍被毁直接影响教学，失学的莘莘学子中的许多人或许从此不可能再进学校的大门，而有些损失是根本无法得到补偿的。例如，暨南大学图书馆张凤博士 20 多年来收藏

了 120 种中外古物，总数达 4750 余件，它们都在这次战争中化为了灰烬。

1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左右，位于闸北的我国著名的出版机关商务印书馆中弹起火，至下午 5 时左右其所属总厂、翻译所、尚公小学及东方图书馆均被炸毁，书本灰烬弥漫天空，其有形的直接损失达 1400 万元！然而其无形的损失更令人痛惜。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当时最大、也是最具权威的出版社，全国大、中、小学的课本，知识界的绝大多数著作都是从这里印刷的，而今却被无情的战火吞噬殆尽。这里的东方图书馆被当时人们称为“我国东南图书巨擘”，是国内有数的收藏最丰的图书机构之一。到 1931 年为止，图书馆中实藏普通中文图书 26.8 万余册，外文图书 8 万余册，图表照片 5000 余种。所收善本书包括旧四部名书、方志及中外杂志报章尤为珍贵。此外，馆藏中外报章杂志极为完备，有的系海内外孤本。这一初建于清光绪 30 年（公元 1905 年）、占地 4600 平方米的图书馆的被毁，不但是中国的巨大损失，也是世界文明的损失。当消息传出时，人们不禁“举目此望，黯然心伤”。

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非战建筑和文化教育设施的狂轰滥炸，完全暴露出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残暴的本性，它的罪恶行径只能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遭到一切爱好和平人们的齐声谴责。正如一位美国作家写下的：“全世界还从来未看见过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所造成的结果”，“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儿童被炸得粉身碎骨，盐泽海军上将（应为少将）从此以‘屠杀婴儿的刽子手’而闻名于西方”。因为犯下这滔天罪行的绝非盐泽一人，因此我们实应称这伙侵略者为“屠杀婴儿的刽子手”们。

十四、“死我一人生百人”

淞沪抗战爆发后不久，上海各界民众便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随着战争的持续，这场运动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爱国的旗帜下，军民一致协力抗战，成为淞沪抗战的一大特征。而这场民众抗日运动的显著特点，便是群众的抗日运动和爱国军队的武装抗日斗争紧密结合，民众运动以支持前线、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抗日战争为中心。各界民众热烈声援抗战支援军队作战，组建抗日救国义勇军和各种战地服务队伍，掀起反日罢工斗争，捐献金钱物资，慰问抗日将士，救治受伤官兵等成为这一时期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基本内容。这类的活动多得实在不胜枚举，在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中一位极普通的胡阿毛烈士的故事即是一例。

胡阿毛是一位 41 岁的驾驶员，家中还有一年迈的老母。2 月 26 日下午，他到虹口百老汇路（今大名路）探亲访友，行至中虹桥附近时被日军搜查出其驾驶执照。日军将他拖到汇山码头日军司令部拘禁。第二天早晨，日军士兵 4 人将他押解到满载弹药的卡车上，逼迫他驾驶卡车去公大纱厂。胡阿毛佯装答应，在日军的监押下，他开足马力急驶，将到公大纱厂时，只见车头一转直扑黄浦江，结果连人带车一起坠江捐躯身亡。车上四名日军也葬身江中。当时上海的《申报》曾载诗一首歌颂胡阿毛烈士的事迹：

“车辘辘，
行何之？
敌兵载我沙场驰。
哀车中，
累累物！
千辟万灌毒所郁。
一弹可制一人命，
毁之胜杀百枭獍。
时呼一去不可更，
今日之事我为政，
死我一人生百人，
一死乃不负厥身。”

对于这场军民联合反抗外来侵略的自卫战争，蔡廷锴的体会最为深切：“这回战争上所表现的力量是民众的；所以，如有光荣可言，亦是民众的光荣。惟民众的力量才是伟大的、真实的力量。离开了民众，我们便失去了内在的生命和存在的价值了。”十九路军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也有同感：“此次与日军作战，屡战屡胜，非我十九路军之力量，实民众之力量，民气即士气，民力即军力。”这些话揭示了军民联合一致抗日是克敌制胜的根本之道。

十五、全国各地和海外侨胞的呼声

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同样震惊了全国，各地民众用各种方式支援淞沪抗战。

南京各界民众率先声援淞沪抗战，他们通电全国提出对日绝交等各项主张，同时开展募捐、征集物品支援前线。1月30日晚，驻守南京的十九路军一部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参战，南京各界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前去送行，一时间人数多达5万左右，盛况空前。

与此同时，华北各省、广州、武汉等地的民众也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支援方式。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慰劳信函达七八千封，捐款额达700余万元，捐献的食品、用品、器材和工具等的数量更是可观，这一切都给了淞沪抗战十分有利的支援。正如蒋光鼐所言：“淞沪之役，我军得民众莫大之帮助，近者箪食壶浆，远者输财捐助，慰劳奖饰，永不敢忘。”

世界各地的侨胞也起来支援了。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的侨民的汇款源源而来。尤其是美国的侨胞更是热忱洋溢，旅美华侨捐款达500万元，其中仅纽约一地捐款就达100万元。唐人街上龙灯飞舞，娇小可爱之女孩也出售桃花，凡此种种都是为了向祖国捐款抗日。旧金山市华侨周崧捐款20万元，他还声明：如中国对日宣战，愿捐助军饷100万元。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黄澄华（黄兴之女）出售自己的首饰，以所得之款捐助淞沪抗战。她对外界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归国服务，虽死不辞！”

新加坡华侨的捐款也很踊跃。实业家陈嘉庚曾捐助1万元，华侨巨商胡文虎先后3次共捐赠了3万元，为此蔡廷锴特题词表彰胡文虎的巨大贡献：“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在他们行动的感召下，不到2个月时间，新加坡华侨已捐款近百万元。

到淞沪抗战结束，十九路军公布收到捐款总数为1068万元，其中内地和港澳地区约占54%，海外侨胞约占46%，他们收到的物资则是不计其数。这些对淞沪抗战起到的作用是无法形容的。

十六、东京的“索夫团”

世界各国人民和侨居上海的外国人士也用各种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在上海外国人开办的公立、私立医院中，许多医院无报酬地收容医治受伤的中国官兵。有许多英美女士还直接参加了上海民众组织的救护队，或单独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员。外国侨民中不少人捐款、捐物救济难民，有些人还让出房屋作为妇孺临时收容所。一位旅居上海的美国妇女拿来一篮鲜花和一块汉玉，请中国青年会转赠十九路军伤兵，上面仅书“外国朋友致中国英勇的十九路军伤兵”。

淞沪抗战结束后，侵略军为炫耀胜利，决定于4月29日天长节（天皇诞辰日）召开庆祝大会并举行阅兵典礼。然而那天旅居上海的朝鲜独立党成员尹奉吉在虹口公园奋然一掷，致使在沪日方军政要员白川义则等毙命，重光葵等炸伤，使这伙直接指挥侵华战争的元凶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而不久这位执行行刺任务的尹奉吉便献出了其年轻的生命。由于组织此次活动的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警察厅长兼上海韩国侨民会会长金九，因此金九也从此一举成名天下知，“中国朝野对韩人的态度，从此焕然一新，获得了极敦厚的同情。”

“一·二八”事变后，国际无产阶级、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强烈谴责了日本侵略者的野蛮行径。英、法、德、美等国共产党都发表宣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要求撤回本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军舰，同时还纷纷召集群众大会，举行反对战争的示威游行，以此声援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

日本舆论界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径也表示了疑虑和不满。大阪《每日新闻》报2月7日题为《上海事件应善为处理》的社论认为，“今日日本国民中对我陆战队所取之行动，是否为合法性与合理性，实一疑问”，因此要“用武力解决，深恐事态扩大，故极望来第一种和平的方法为宜”。2月10日东京《时事新报》在题为《上海事件与满洲事变》的社论中也忧心忡忡地写道：“满洲事变，已为各国所应惊疑，今又以上海事件而刺激各国之神经，万一各国判别错误，则我日本岂不在国际上发生无穷之恶化哉。”

日本民众在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中备尝了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再加上不断征兵，以致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因此，日本人民也以各种方式反对政府穷兵黩武的既定国策。2月10日，东京帝国大学自治学生会发起召开反战集会，并持红旗游行示威。在东京甚至还有小股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高呼打倒军阀的口号，还散发反对侵略中国的传单。上海战事激烈进行之际，东京有一批官兵的妻子，组织起“索夫团”，群集军事机关门前，哭夫索夫。所征入伍的士兵一旦登车出战，其家属便成群卧身铁轨，阻止火车开动。他们有的被军警用棍棒驱散掉，有的竟被活活辗死，真是惨不忍睹。

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大多反对战争，日侨中的男子被陆军编为便衣队或步兵后，自杀者、痛哭流涕者、自伤者屡见不鲜。当时在沪的日侨妇女半数都是新孀，其中有的悲痛欲绝相约自杀，有的返回日本参加“索夫团”向政府抗争。日本侵华部队内部的反战事件也时有发生，以致参加哗变的士兵被迅速押解回国，以免动摇军心。2月19日，一架飞机飞翔在日军司令部上空，扔下的反战传单上署名为“日本全国无产青年团上海支部”，传单上写道：“我们绝不可执着枪剑杀害与我们同样被压迫的中国人！！你们不要被他们

欺骗！应为正义执起利剑啊！我们无论如何是绝对反对这次无意义的战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淞沪抗战中，这句成语在世界范围内都得到了
又一次的验证。

十七、英美等国的斡旋调停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也是远东和世界重要的港口城市，这里还有着众多的外国租界，因此它自然成为帝国主义国家间争夺的中心。

早在淞沪战争开始的前夜，美国政府即于1月27日向日本政府提出警告，要求日本不要在上海发起战端。1月28日战争终于爆发后，英美等列强便利用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力量 and 影响，从外交方面介入淞沪战场，积极进行调停。这是因为他们绝对不愿意看到日本通过战争手段扩张其在上海的权益和势力范围，也非常担心战争的继续发展将会触发中国人民反帝民族运动的高潮，冲击租界和列强的既得利益。正如有些日本历史学家所说的：“他们对中国的强有力的收复国权运动，早就与日本一样一直胆战心惊。”

英美等国在淞沪战争中，一面偏袒日本，纵容侵略，以牺牲中国来维护其在华利益；一面又秉承各国政府的意旨和“国联”之委托，出面进行调停活动。英美等国的调停活动共进行了4次。

第一次起于1月29日下午，英美各国驻沪领事开始出面调停，中日交战双方同意从当晚9时起暂行停战。31日英美总领事约请中日两国在沪军事长官，在英国总领事署具体磋商避免战祸的办法。会议期间，中方提出日方首先撤兵，中国军队愿退离租界边线2公里处，日方则要求中方撤退炮队。中方以对方不派飞机轰炸为条件，但遭拒绝。英美等国则提出，日方退入公共租界，将所让出之越界筑路线和附近地带，由英美军队暂时维持秩序。讨论最后决定，到2月3日下午5时双方停战，不得相互攻击，具体细则待日方请示政府后再行协商。2月2日下午，日本领事通知各国领事，拒绝调停条件。日军重新频繁轰击我军阵地。英美等国的调停归于失败。

第二次起于2月3日，当天英美等国同时向中日两国提出5项停战条件。中国政府于5日予以答复，除个别字样有所保留外表示接受。日本政府则表示3项可接受，1项拒绝，1项是有先决条件的接受。2月7日，日本政府发表《关于上海事件及派遣陆军之声明》，电述续派军队赴沪之“理由”。于是英美等国的第二次调停也以失败告终。

第三次起于2月12日清晨。由于日本政府拒绝5项停战条件，战事更趋激烈，上海外国工商界均蒙受重大损失，急待战事的和平解决。于是这天清晨，由在沪西方教士发起，经英美等国领事出面，商请中日军事当局同意在闸北停战4小时，以便救护难民撤离战区。当天晚上及14日和18日，英美领事约请中日双方进行反复磋商和平办法。但日方态度极为蛮横，胁迫中方将吴淞、闸北军队撤退20公里，遭到中方的严词拒绝，谈判宣告破裂。18日晚8时45分，日军向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20日晨日军下达了全线总攻的命令。

第四次起于2月25日。当时在沪公使遵照本国政府的命令，以及“国联”的恳留，继续在上海进行调停活动。2月25日各国公使召开紧急会议，拟议草定后由英美等公使分送中日双方军政当局。28日下午，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军事当局代表黄强，应英国远东舰队司令克莱之邀请，在英军旗舰“肯特”号上与日本海军司令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领犬养毅的特使松冈评右，商谈克莱提出的停战方案。“肯特”号会谈的次日，中国方面通知克莱，说中国政府已同意昨天达成的5项谅解事项，如日本政府也表示同意则双方正式代表即可举行正式会议。但是素怀不可告人目的的日本政府，除了以其惯用

的“不即不离”的既定策略应付西方列强的调停外，迟迟不予答复，反而加紧了其军事进攻。3月1日，英法公使先后抵达上海，准备与在上海的中日军政当局接洽。但此时战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十九路军已开始退守第二道防线！

中国军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后，中国外交部旋于3月2日发表宣言，正式接受2月28日的5项谅解事项。当天晚上，日方才发出停战复文，同时由克莱向我方转交所谓立即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显然这些条件与28日达成的5项谅解事项差距太大，中方不能接受。于是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退守的第二道防线展开攻击。3月4日，“国联”大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战，这才迫使日方停止了进攻。依照“国联”决议案的精神，在英美等国的调停下，中日双方又重开了谈判。从日本方面看，日本政府和军部都根据实际情况，认为不能再把战争继续扩大持续下去了，而其直接作战目标也已达到，再加上日本当时的侵华扩张重点在于我国东北地区，所以从此看来，并不存在无缘无故的停战。

十八、上海停战谈判和《淞沪停战协定》

关于中日停战问题，“国联”曾召开过各种公开的、非公开的大小会议，对促进双方谈判起了一定的作用。“一·二八”事变发生次日，中国即向“国联”提出申请，企图依赖“国联”制止日本的侵略行径。“国联”则消极被动，主要以会议形式研究中日交涉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复杂的情景，即一方面“国联”在日内瓦频频举行会议，研究解决办法，一方面英美等国公使、领事仍在上海进行不断的调停。这两者的行动互相配合，一脉相承，其共同点是历时甚久成效甚微，对日本侵华采取的是养虎贻患、损人利己的绥靖政策。

从1月30日“国联”理事会决定受理中国政府的申请，决定组团派员前往淞沪战场进行调查起，到2月30日“国联”全体大会一致通过《上海中日问题决议案》（日本弃权不投票）为止，“国联”关于淞沪案件的讨论告一段落了。3月4日，“国联”作出决议，要求中日两国进行停战撤军谈判后，上海的中日两国代表在英美等国使节的斡旋下，在谈判桌上又展开了新一轮的激烈斗争。

3月6日，蒋光鼐电告前线将士：“倘日军不向我攻击，我军亦不向彼攻击；如日军违背国联决议施行攻击，我军仍须抵抗。”同时日方迫于各方情势，也不得不表示停止进攻。可事实上自从中国军队撤退第二道防线后，日军的挑衅、进攻从未中断过。从3月9日到4月14日，中日双方进行了多次反复的谈判，但由于日方的蛮横无礼，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谈判陷入僵局之中，只得宣告暂行休会。为此中国再向“国联”提出申诉，随后英美等国使节又继续奔走调解。4月26日中日双方又重开谈判，经过数轮谈判后，到28日停战协定实际上已告完成。

然而风云突变，4月29日上海虹口公园尹奉吉行刺案发生了，停战协定有可能再度搁浅。但是迫于各方压力也想早日结束战事的日本政府训令重光葵公使，停战会议不得以炸弹案而停顿。随后中日两方又进行了数轮艰苦的谈判，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5月5日，《上海停战协定》在英国领事馆正式签署。中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和日本首席代表重光葵，中日两国其他谈判代表戴戟、黄强、植田谦吉，以及英、美、法、意四国公使在协定上签了字。按照这一协定，日军将在四周内撤出闸北、吴淞等地，但仍可驻扎在公共租界和越界筑路地段，并可暂时驻扎在与上述区域毗连的地方，中国军队不准进入日军撤出的地区，只能派警察接管。这是一个丧权辱国、出卖上海人民抗战成果的可耻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的成立，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从甲午战争以来，尤其是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向中国侵略扩张又迈进了一大步，也表明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政策造成了又一严重恶果。它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化过程的进一步加深，它在中国近现代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上又增添了屈辱的一页。

十九、“忠魂长绕大江南”

“一·二八”淞沪抗战是我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在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高举起了爱国主义的旗帜，冲破了国民党及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它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增强了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淞沪战争中的军民联合抗战更是为民族自卫战争开辟了一条胜利的道路，但由于中国军队实行的是单纯防御，加之兵力不足，以致不能击破敌军的进攻，导致战局的失利。淞沪抗战是一次局部抗战，正因为如此它没有也不可能直接转变为全国的全面抗战，但是它为以后的全面抗战的爆发开辟了道路。

“是国家柱石，是民族先锋，气吞倭寇，神勇远震全世界！”

“为正义牺牲，为和平奋斗，血溅沪野，忠魂长绕大江南！”

这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当夜，在闸北首御日军的十九路军一五六旅第六团团团长张君嵩送给淞沪抗日阵亡将士追悼会的一副挽联。它充分地表明了淞沪抗战虽然结束了，但是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更加高涨了，它更预示着中国的一场全民族的民族解放战争终究是要到来的，而且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